



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丛书

主编 李宇明 张西平

# 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二）

主编 张西平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北京外国语大学汉语国际推广多语种基地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丛书

联合项目

## 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二）

主 编 张西平  
副主编 李 真 杨慧玲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 二/张西平主编.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9

(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100-17009-3

I. ①国… II. ①张… III. ①汉语—语言教学—教育史—文集 IV. ①H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01124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 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二)

张西平 主编

李真 杨慧玲 副主编

---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7009-3

---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9 1/4

定价:38.00 元

# 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丛书

策 划：北京外国语大学汉语国际推广多语种基地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原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

主 编：李宇明 张西平

副 主 编：柳若梅

编委会成员(按音序排列)：

陈国华 冯 蒸 李雪涛 李宇明

柳若梅 马西尼(意大利)

孟柱亿(韩国) 内田庆市(日本)

王建勤 姚小平 张 博 张西平

张晓慧 赵金铭 周洪波

## 卷首语

自2003年出版《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调查》一书以来,在学术界前辈关心和支持下,2009年我又主编了《世界汉语教育史》,此书作为对外汉语教育专业的教材被不少高校采用。随着汉语在世界各国广泛传播,世界各国的汉语教育史也开始被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投入到这个领域进行研究。

中国文化在不断与外部文化相交融中发展、变化、丰富,中国语言也是如此。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中说:“中国语言学曾经受过两次外来影响,第一次是印度的影响,第二次是西洋的影响。前者是局部的,只影响到音韵学方面,后者是全面的,影响到语言学的各个方面。”<sup>①</sup>但王力先生谈近代中国语言所受的西洋影响,是从晚清说起的,实际上,这个影响要从晚明开始。晚明来华的传教士,为了适应中国环境,首先致力于学习中国语言。为了直观地记录中国语言的发音,他们发明了用罗马字符给汉字注音的方法,由此产生了汉字系统的拉丁字母注音方案;为了满足西人学习汉语的需要,他们编写了带有西人汉语研究印记的汉语语法书和汉—欧词典;为了表达新的思想,他们创造了一大批新词。近代中西语言文化交流就此拉开帷幕。从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末,天主教来华传教士、欧美新教传

---

① 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73页。

教士、欧美驻华外交官、海关洋员等西人的汉语著述传统,绵延三百余年而不绝。

西人的汉语学习与研究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语言的变迁。1929年10月,罗常培先生在《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三分上发表了《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一文。他高度表扬了明代来华传教士利玛窦、金尼阁等人,认为他们为汉语语音的研究立了大功,因为他们用了罗马字给汉字注音,还用了罗马字标记汉语官话语音,这在中国是一件破天荒的事情。这样,西人的汉语研究就从一种外学变成了一种内学,本来是外国人为学习汉语所做的研究,结果开始影响汉语本体的变化,并最终成为汉语从古代形态变为现代形态的重要原因之一。由此,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就和中国自身的语言学问题的研究成为一体了。

从语言学上来看,这也是件大事。索绪尔把与语言有关的因素区分为“内部要素”和“外部要素”,认为语言的“外部要素”不触及“语言的内部机构”而予以排除。他说:“至于内部语言学,情况却完全不同:它不容许随意安排;语言是一个系统,它只知道自己固有的秩序。”<sup>①</sup>语言是一个同质的结构,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内部稳定的系统和特点。这样,他们把语言的外在因素放在了一边,对语言的变异不太关注。

语言接触(Language Contact)于十九世纪开始逐渐被认识,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成为语言学研究的热门话题,甚至有成为语言学一个分支的趋势。同时,语言接触也得到社会语言学的关注,语言的“外部要素”成为历史语言学主要内容的一部分。如 Theodora

<sup>①</sup>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6页。

Bynon 1977 年出版的《历史语言学》一书的上半部分讨论的是语言发展的模式 (Models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下半部分讨论的是语言的接触。英国学者 R. L. Trask 1996 年出版的《历史语言学》中的一章, 题为“接触, 语言的生和死”(Contact and Birth and Death of Language), 讨论语言的接触。

语言的变化并不仅仅在于内部因素, 外部因素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即语言接触会引起语言的变化。语言接触是通过语言使用者来实现的, 因此, 它和人群之间的互动有关。现在国内研究语言接触的学者大都在研究中国方言之间的接触和相互影响, 这当然是对的。但对汉语的变化影响最大的是汉文化两次与外部文化的交流——一次是佛教传入中国, 一次是晚明后基督教传入中国。

学术界对佛教传入中国后对汉语的影响, 特别是对佛经翻译中梵语对汉语的影响, 研究已经比较充分, 但对基督教传入后, 以罗曼语族为代表的西方语言系统对汉语的影响的研究还显得不够, 亟待深入展开。由此, 我们引出关于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研究的议题。

历史语言学说明, 语言接触大体有三个阶段: 语言接触—语言影响—语言变化。罗曼语族所代表的西方语言系统在和汉语接触中对汉语的影响是一个逐步展开的过程, 从晚明到晚清, 从民国到现在, 历经四百年之久。学术界对此已经有了初步的研究。汉语和罗曼语族所代表的西方语言系统的接触对汉语产生了四个方面的影响:

一是词汇影响。罗常培先生将语言接触中的词汇变化称为“借字”, 他认为所谓的“借字”就是一国语里所孳杂的外来语成分。这方面学术界已经有了很好的研究, 高名凯先生、史有为先生等都有著作, 但他们对近代以来的基于中西文化交流基础上的外来词研究不够, 这些年马西尼先生、内田庆市先生、沈国威先生在这方面做了许

多工作,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二是语音影响。罗常培先生的《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做了开创性的研究,但至今这仍然是一个待开拓的研究领域,特别是顾炎武、刘献廷等明末清初的考据学家在音韵学上的研究和传教士音韵研究的关系仍有待深入。从王徵和金尼阁的《西儒耳目资》后,汉语的注音系统开始逐步变化,到现在汉语拼音已经成为汉语学习的一个重要手段。近年来张卫东先生的研究很值得关注。

三是语法影响。汉语语法著作是传教士首先开始编撰的,从卫匡国到万济国,再到马若瑟,最后到新教来华传教士的汉语语法著作编撰,这成为西方汉学史上一个重要的学术传统,而直到1898年马建忠才编写了第一部汉语语法著作。语法研究由外到内,中国近代语言发生了重大变化。

四是词典的编撰。中国自古有双语词典编撰的传统,四夷馆中也有系列这样的词典,如刘迎胜先生整理的《回回馆杂字》就是元代的波斯语与汉语的双语词典。但中文与罗曼语族接触后所编撰的双语词典则起源于传教士,从利玛窦、罗明坚所编撰的《葡汉词典》到新教传教士马礼逊所编撰的浩大的《英汉汉英词典》,这方面他们留下了有重要学术价值、至今尚未系统整理的学术文献。以上所有这些变化都是由于传教士来华后,欧洲语言和中国语言接触后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这样我们看到,如果要弄清中国近代语言学史,近代以来基于中西文化交流基础上的语言接触的历史是一定要搞清楚的,如果这一段搞不清楚,我们就无法说清中国近代语言学史。语言研究需要有历时性的眼光,加大对语言接触的研究就十分必要。

在语言接触中语言发生变化,这点已经得到承认,但如何研究各



种语言的变化？就汉语来说，我们如何展开近代汉语中的这种语言变化的研究呢？如何在这样的研究中揭示语言接触中的基本理论问题呢？这是我们要考虑的。

目前的研究主要是共时性研究，即研究一个时段的语言接触对汉语所造成的影响，这是正确的。因为，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是建立在历史基础上的，没有对一个一个特定时段、语言在其共时态下的变化研究，我们根本无法概括出中国近代语言的历时性变化。因此，现在对基本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对重要文本的具体研究都是很重要的。

语言的变化既需要聚焦每一个特定的时段，更需要从历时的角度考察语言接触过程中，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徐通锵先生提出语言的变化是“有序异质”，在有序和无序中逐步发生变化。现在在语言接触的研究中对十九世纪后西方语言对中国语言的影响研究比较深入，对晚明后耶稣会来华后对中国语言的影响研究相对薄弱。实际上近代中西语言的接触历史应该从晚明开始，从晚明到民国这三百多年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探讨语言接触对语言变化影响的机制问题，“具体而言，在语言接触过程中，到底哪些因素对语言的变化起到制约作用？不同因素对语言变化的制约力如何？语言接触究竟是怎样导致语言变化的？只有对这些问题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才可能解释语言接触所引发的语言变化机制”<sup>①</sup>。

所以，语言接触的研究对研究中国近代语言学史是很重要的，例如，我们现在清楚了西方人早期汉语语法研究的基本脉络，但这种外

---

<sup>①</sup> 王新远、刘玉屏《论语言接触与语言变化》，薛才德主编《语言接触与语言比较》，学林出版社，2007年，第35页。张西平、杨慧玲编《近代西方汉语研究论集》，商务印书馆，2013年。李葆嘉《中国转型语法学：基于欧美模板与汉语类型的沉思》，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王立达《汉语研究小史》，商务印书馆，1963年。

部的因素是如何逐步进入到中国内部的,从而形成了现在中国语言的研究,我们看得不是很清楚。语言接触一般认为亲属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比较大,非亲属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要小些,但我感到中国近代以来在语言的接触中似乎非亲属语言对中国语言的影响更大些,梵语是屈折型语言,罗曼语族也是屈折型语言,而汉语是典型的孤立型语言,用虚词和语序而不是词尾屈折变化来表示语法关系。但经过与梵语和罗曼语族的接触,特别是近代以来欧风美雨的洗礼,汉语书面语已经相当欧化。这些都是汉语史研究的重要内容,都要做对比语言学研究。

在《世界汉语教育史》一书的导言中我曾写道:

世界汉语教育史是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它极大地拓宽了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研究范围,使学科有了深厚的历史根基;我们在总结和提升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基本原理和规律时,不再仅仅盲目地追随西方第二语言教学的理论,而是从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悠久历史中总结、提炼出真正属于汉语本身的规律。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在这一研究中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理论和方法做出我们的贡献,将我们的历史经验提升为更为一般的理论,使其具有更大的普遍性。尽管这还是一个遥远的目标,但在学术上则是必须要确立的一种文化自觉的理念。

同时,我们在这一研究中将会强烈地感到,中国语言学史的研究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中国本土范围,中国语言对外国语言的发展和影响正是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历史中产生的,这不仅表现在东亚一些国家的语言形成和发展中,也表现在西方近代以来的语言变迁中。把世界汉语教育史的研究纳入我们的学术视野,我们对中国语言的思考、对“汉语国际教育”的研

究,都将会扩展到一个更为宽阔的学术空间。

这是八年前所写的文字,直到今天仍是需要我们努力的。为推动世界汉语教育史这一领域的研究,我们特创办《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这一学术刊物,将其作为所有关心这一领域研究的学者的共同阵地。

张西平

2018年2月22日

# 目 录

## 历史研究

- 汉字在西方早期的传播 ..... 张西平 1
- 《海外奇谈》的语言来历和继承 ..... 奥村佳代子 24
- 法国汉学中汉语研究的嬗变
- 以《汉语札记》和《汉文启蒙》为例 ..... 李 真 38
- 晚清新教在华汉语培训学校的创办与发展 ..... 卞浩宇 51

## 文献整理

### 《无师初学英文字》研究

- 清末南北官音差异的一斑 ..... 内田庆市 65
- 《美国东方学会会刊》(1843—2012)中的汉语研究 ..... 孟庆波 75

## 教材研究

### 清末民初东北方言语音研究

- 以清末民初日本人所编汉语东北方言教科书为例 ... 李 逊 98
- 《千字文》在日本汉语教学历史上的价值 ..... 刘海燕 110
- 日本明治时期汉语教科书的作者群体研究 ..... 徐丽、颜峰 122

## 语法研究

- 《汉文典》(1877—1911):清末中日文言语法谱系 ..... 李无未 131

《中国言法》与《通用汉言之法》之比较研究 .....	康太一 166
<b>词汇研究</b>	
琉球官话课本中方言词语的重新审视	
——以清代闽人官话正音书《新刻官音汇解释义音注》等为据 .....	范常喜 184
麦都思《新约全书》的语言特征 .....	盐山正纯 197
民国时期华人社会方言和国语关系研究	
——以东南亚华人社会为对象 .....	于锦恩 213
<b>语音研究</b>	
十九世纪西方人关于汉语拼音问题的讨论 .....	江 莉 223
内地会拼音系统探析	
——以《英华合璧》为中心 .....	岳 岚 237
<b>词典研究</b>	
从马礼逊《汉英英汉词典》反思当代汉语学习词典的问题 .....	杨慧玲 250
从湛约翰《英粤字典》看传教士眼中粤语词汇的变容 ...	韩一瑾 260
早期双语词典所选汉语词汇特点	
——《葡汉辞典》与《汉英大辞典》比较 .....	陶原珂 271
<b>国别教育史</b>	
汉语国际教育师资本土化培养问题刍议	
——基于老挝汉语教学师资现状的考察与思索 .....	王建军 282
简论东南亚华侨华人的中华文化传播 .....	耿 虎 293
《国际汉语教育史研究》征稿启事 .....	300

# 汉字在西方早期的传播

张西平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

在中国文化西传的过程,汉字的西传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西方人的汉语学习和研究也是首先从认识汉字开始,而后逐步进入对汉语语法的研究。大航海后,<sup>①</sup>西方人对汉字的认识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大背景下所发生的一种文化相遇。我们应把西方人这一认识过程放在中西文化交流史的大背景下考虑。东亚汉字文化圈由来已久,当葡萄牙人越印度洋来到澳门,西班牙人越太平洋东来后首先抵达菲律宾,并开始在菲律宾刻印中文书籍,耶稣会则首先进入日本,西人已经进入汉字文化圈。因此,我们对西人认识汉字的历史进行考察时应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东亚。“相对封闭而单一的传统研究模式不足以获得对于历史的完整认识与理解。……决不能自囿于国境

---

<sup>①</sup> 在大航海以前元代时期来到中国的马可·波罗和方济各会的传教士对中国文字也有过简略的报道。意大利人柏朗·嘉宾到达蒙古都城哈喇和林,居住四个月后启程返欧,著《蒙古史录》介绍契丹,其中第9章有一句,谓契丹国有一部(指南宋)“自有文字”;1253年,法国国王圣路易派教士鲁布鲁克出使蒙古,其中《纪行书》中亦有一章提及中国文字及书写方法:“其人写字用毛刷(即毛笔),犹之吾国画工所用之刷也。每一字合数字而成全字。”《马可·波罗行纪》(冯承均译,上海书店,2001年)第2卷第28章一笔带过说:“蛮子省(Manji,指中国南部)流行一种普遍通用的语言,一种统一的书法。但是在不同地区,仍然有自己不同的方言。”张星娘《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77年,第186—189页。伯希和《蒙古与教廷》,冯承钧译,中华书局,2008年。

线以内的有限范围,而应当置于远东、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并相互印证。”<sup>①</sup>

笔者认为,汉字西传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汉字的描述阶段。最早来到东亚的传教士们见到汉字,开始在书信中向欧洲介绍和描述汉字,从而为后来在欧洲呈现汉字字形打下了基础。第二个阶段是汉字的呈现阶段。在欧洲介绍东方的书籍中开始出现汉字,由简到繁,由少到多,从而使欧洲人在书中看到真正的汉字,为他们后来研究汉字打下基础。第三个阶段是汉字的研究阶段。在这一阶段,欧洲开始有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汉字的文章和著作。

本文以十七世纪汉字西传历史为线索,对这一时期西方对汉字的研究暂且不做展开。本文的中心是要历史地再现汉字在十七世纪欧洲的出版物中是如何呈现的。只有摸清这段历史,才可以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打下基础。目前学术界对此虽有一定的研究,但大多不够系统,且疏漏较多,本文试图做系统梳理。

### 一、欧洲人早期对汉字的描述

欧洲人对汉字的认识是从对日语的认识开始的。耶稣会首先进入日本,开始知道日语,并由此接触到了汉字。最早在信件中向欧洲介绍汉字的应是首先来到东方的耶稣会士圣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1548年,他在科钦写信给罗马一位耶稣会士,信中简要地提到了自己从葡萄牙商人那里听到关于日本的僧侣使用汉字,中日之间用汉字进行笔会的情况。同时,他也从果阿神学院院长那里得知了一个皈依了天主教的日本武士所介绍的日

<sup>①</sup> 戚印平《远东耶稣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8页。

本汉字的情况,进一步知道了汉字在东亚的使用类似于拉丁语在欧洲的使用。1549年,沙勿略在科钦写信给会祖罗耀拉(Ignatius Loyola),信中介绍了他和这位日本武士谈话后所了解到的汉字特点。他写道:“(他们的文字)与我们的文字不大相同,是从上往下写的。我曾问保罗(日本武士弥次郎——译者注),为什么不与我们一样,从左往右写?他反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像我们那样写字呢?人的头在上,脚在下,所以书写时必须从上向下写。关于日本岛和日本人的习惯,送给你的报告书是值得信赖的保罗告诉我的。据保罗说,日本的书籍很难理解。我想这与我们理解拉丁文颇为困难是相同的。”<sup>①</sup>

1549年,沙勿略进入日本,对日本的语言和汉字有了直接的感受。1552年1月29日,他在给罗耀拉的信中再次介绍了日本汉字的特点,日本汉字与中国汉字之间的关系。他说:“日本人认识中国文字,汉字在日本的大学中被教授。而且认识汉字的僧侣被作为学者而受到人们的尊敬。……日本坂东有一所很大的大学,大批僧侣为学习各种宗教而去那里。如前所述,这些宗派来自中国,那些书籍都是用中国文字写成的。日本的文字与中国文字有很大的差别,所以(日本人必须重新学习)。”“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的口头语言有很大不同,所以说话不能相通。认识中国文字的日本人可以理解中国人的书面文字,但不能说。……中国汉字有许多种类,每一个字意为一个事物。所以,日本人学习汉字时,在写完中国文字后,

---

<sup>①</sup> 《沙勿略全书简》,第353—354页。转引自戚印平《远东耶稣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170页。关于沙勿略和弥次郎的研究参见唐纳德·F.拉赫《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一卷第二册),周宁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0—204页。



还要添补这个词语的意思。”<sup>①</sup>

和沙勿略一样,随后前来日本的耶稣会士们在掌握日本语言上仍存在困难。胡安·费尔南德斯(Juan Fernandez)曾是沙勿略的同伴,沙勿略认为他在讲日语和理解日语方面是“我们中最好的”。在学习过程中,费尔南德斯对日语有了一定的理解,知道了中国文字在日本是有学问人的书写语言,也知道了日语对汉字做了适应性的改革,以汉字草书体表示一般性的音节文字,这被称为平假名(Hiragana),在此之后,他更是找到了对语言问题的解决方案。例如,知道了汉字经常传达多种含义。<sup>②</sup>

沙勿略和他的同事们虽然最终没能进入中国境内,但他们在日本通过对日语的学习开始接触到汉字,并对汉字形成了初步认识: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汉字书写时是从上向下的;汉字是表意文字,一个字代表一个事物;汉字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通用语言,书写相同,发音相迥。<sup>③</sup>

另有一些传教士或商人来到中国附近甚至还曾短期地停驻中国,他们也描述了自己所知道的汉字。1548年,一篇写于果阿的佚

---

① 《沙勿略全书简》，第555页。转引自戚印平《远东耶稣会史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第134—135、173页。

② 唐纳德·F.拉赫《欧洲形成中的亚洲》（第一卷第二册），周宁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19页。

③ 关于天主教在日本的研究，参见 John, W. & Witek, S. J.,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s: Japan and China in Comparison, 1543-1644: Reflections on a Significant Theme*; Ignatia Rumiko Kataoka, *The Adaptation of the Sacraments to Japanese Culture during the Christian era*. 两篇文章均收录于 Üçerler, M. Antoni J.(ed.), *Christianity and Cultures: Japan & China in Comparison, 1543-1644*,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2009, pp.337-341, pp.113-125.